

解 雜 著 李 廷 先 著

解

著

雜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序 言

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及其准备与实施问题为考察对象的军事科学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孙武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光辉的军事著作，为我国军事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哲学凝结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以往的兵书和其他有关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军事哲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和他在军事论著中所阐发的丰富多彩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军事问题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果，也是对人类历史优秀军事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研究军事理论，特别是研究军事辩证法，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去审视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这样才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上更上一层楼，把军事科学研究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刘先廷同志到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辩证法研究工作已十余年。除积极参加有关军事辩证法的重要学术专著的编写以外，他还写了不少这方面的学术文章。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战争哲理杂解》，就是从他所写的短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从这些涉及面比较宽广的文章看得出来，他的研究态度是认真的，是肯于动脑，勤于动手的。这本书的问世，对于有志于学习和研究军事理论的同志，特别是对军事辩证法感兴趣的读者，是会有所帮助的。其他读者从中也可以得到战争哲理方面的知识。至于其中的所有论点是否完全精当，我相信读者的眼力。我同时还相信，如果因有不同的观点而引起学术上的讨论，这对于军事理论研究的活跃也将是很有裨益的。

在《战争哲理杂解》即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之际，应作者及编者之邀写了上面几句话。是为序。

郑文翰

1991年12月29日

目 录

序	郑文翰
---------	-----

胜利的根源中必有哲学

军事家与哲学家	(1)
研究战争的着眼点	(5)
谈“用力省而成功多”	(8)
滚扫器、创造性与思维方式	(11)
先秦战争起源说	(13)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思考	(17)
墨子的“攻”与“诛”	(20)
将总文武	(24)
从八阵图到鸳鸯阵	(27)
蹇叔的战略方法论	(31)
孙臆论“兵之情”	(34)
孙臆战术小考	(36)
从《隆中对》说战略	(40)
“物尽其用”与战术创新	(43)
马奇诺防线的功与过	(45)
智勇与学习	(47)

古代兵法中的哲理

说“形名”	(50)
-------------	------

谈“分数”	(54)
论“奇正”	(58)
解“虚实”	(63)
“兵不杂则不利”	(66)
“察物之理，究物之用”	(69)
“事之而不穷”	(72)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75)
“兵有长短”	(80)
“以迂为直”	(83)
“金火相守则流”	(86)
“三军可夺气”	(88)
兵家贵势	(91)
胜不可一	(94)
先发制人	(96)
后发制人	(99)
且说“走为上计”	(102)

军事哲学是谋略的核心

“谋”是什么	(106)
“谋当底于至善”	(109)
谋于实，不可敌	(112)
“上兵伐谋”面面谈	(115)
孙子的预测学	(118)
给敌人以错觉	(121)
从“蹇叔阻师”谈“先知”	(125)
“官渡之战”话判断	(128)
提高主体能力	(131)
美人计与丑女计	(135)

动物助战的启示·····	(137)
“敢死队”溯源·····	(140)
费边战略·····	(142)
韦维尔的“迷魂阵”·····	(147)
诡道：丘吉尔谋略哲学的精髓·····	(149)
后记·····	(155)

胜利的根源中必有哲学

军事家与哲学家

在中外军事史上，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那就是大凡有伟大建树的军事家，往往都有丰富的哲学知识，有的军事统帅同时也是有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亚历山大的事业，就表现了哲学的实际用途。戴高乐将军对此讲得更明确：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可以处处看到亚里士多德。

亚历山大（前 356—前 323 年）是古代马其顿的国王，备受西方人推崇的军事家。他在击败希腊各国控制了整个希腊之后，以马其顿——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统兵征战近十年，打败了位居亚洲东部的以大流士为国王的波斯王国，征服了埃及，然后打到印度，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空前辽阔的大帝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使希腊进入了“外部极盛时期”。

十分有趣的是这位跃马东方的“大王”，原本是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恩格斯说过，亚里士多德（前 384—

前 322 年)是古希腊学问家中最博学的人。研究过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美学、天文学等许多学科,成为这一系列专门知识领域的奠基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养成了广泛的学习兴趣和追求新知识的可贵性格。在远征亚洲期间,常常是白天打仗,晚上秉烛苦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在进攻波斯帝国时,虽然首战在格拉尼卡取得了胜利,但当他认识到波斯的命脉和优势在于控制着北非和东地中海沿岸,据有海上霸权,便及时改变战略,挥师南下,直达地中海沿岸,占领了埃及等地。接着又向东攻入波斯的中亚腹地。在高加米拉大会战中,再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在印度河的支流希达斯派斯河附近与印度的军队相遇时,亚历山大用佯装撤退的假象麻痹对方,然后夜间从上游渡河,突然出现在印军阵后,从而避开了无法正面攻破的印军大象兵阵,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亚历山大一生中转战 6 万 4 千公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战争艺术,把古希腊的军事学术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使他在西方赢得了如同孙武在东方一样的地位。

色诺芬(约前 430—前 355 年)也是西方军事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此人和柏拉图是同学,曾一起从师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而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高足。色诺芬曾参加希腊雇佣军,随波斯的小亚西亚总督小居鲁士(波斯王大流士二世的幼子)去东方和其兄争夺王位。失败后,雇佣军由亚洲向黑海沿岸长距离撤退,史称“万人大撤退”。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色诺芬被推举为领袖之一。在此之前,还不曾有一支东征的希腊军队回返欧洲,但色诺芬却发挥了自己的军事领导才能,克服了给养缺乏的重重困难,战胜了敌军的

袭击堵截，率领雇佣军回到了欧洲。色诺芬的成功，使整个希腊城邦为之震惊。色诺芬的《远征记》一书，记述了这次撤退的详情。西方人把《远征记》视为希腊的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色诺芬写过两本关于骑兵的专著：《为骑兵长官筹划》和《为骑兵筹划》。他写的《希腊史》成为修昔底斯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书中确定了伊巴密波达的新战斗队形的定义。在有关回忆苏格拉底的著作中，他曾试图划分战术和战略的区别。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之所以具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原因也在于他是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军事问题的。他的思想受胎于黑格尔。恩格斯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书“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列宁称克劳塞维茨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并且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

这种哲学与军事、哲学家与军事家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军事史上更是不乏其例。春秋时期的孙武，在其名著《孙子》兵法中，熔军事和哲学于一炉，在当今世界，不仅军事家们把它视为必读之书，哲学家们也很重视对它的研究。孙武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认为是“科学的真理”。孙武提出的奇正、虚实等理论，对认识军事规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当上吴国的将领之后，以三万军队与楚国军队三十万相战，开始只以少量兵力袭扰楚国边境，消耗疲劳楚军，后又长途奔袭，攻陷楚都郢（今湖北江陵），体现了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孙膑兵法》中

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很丰富。他首先揭示了“胜不可一”的军事原理。孙膑赛马的故事，成为军事运筹学的先声。孙膑的“围魏救赵”、救韩的谋略，体现了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认识战争的思想。墨翟是个哲学家，也是个军事理论家，通晓军事，特别精通防御之法。三国时的诸葛亮，集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宋代的陈规，在其《守城录》和使金兵无可奈何的守城实践中，同样也体现了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在毛泽东的军事文献里，人们更可以看到哲学与军事、哲学家与军事家的完美的统一。一些国民党的将领在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时，感慨地说，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国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

在战争胜利的根源中，之所以能够处处看到哲学的作用，这是由哲学的特殊的性质决定的。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一门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有人把哲学比作是智慧的燧石，这话是很形象很准确的。军事家头脑中的哲学思想，一旦在战争实践中碰到疑难问题的撞击，便会闪耀出妙巧的谋略的火星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凝聚了人类最高智慧（当然也包括了人类关于战争的最高智慧）的燧石。现代战争，贯穿着技术高度密集的武器较量，更贯穿着知识和智力的竞赛。要想在未来的战争中成为所向无敌的聪明的指挥者，对军事哲学的学习，绝不可有丝毫的忽视。

研究战争的着眼点

研究战争应从何处着眼？毛泽东曾经指出，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矛盾，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只有把握各个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研究和指导战争，离开了战争的特点，就无法真正认识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的特点。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特点，并据此提出了我们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科学的。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上说，必须着眼其特点，从每一战役、战斗来说，也必须着眼其具体特点。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个性独具、特色鲜明、威武雄壮的活剧。以解放战争为例，在初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依照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我军在西北战场以“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加以消灭，取得了三战三捷；在华东战场，我军则运用打回马枪的战法，有效地歼灭了敌人；而东北我军，采取的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办法，迫使敌人在战略上转入守势。我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又根据不同时间不

同空间敌我双方之不同特点，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围一个、挟一个、打一个”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隔而不围”、“围而不歼”的作战方针，并且在解决敌军时创造了各具一格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从而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

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由于时间空间的不同，由于敌我双方特点的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不应当采取一个固定的模式（虽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必须探求这类矛盾的同中之异，即把握不同战场的不同的特点，采取适应这种不同特点的不同方法。那种不愿意或者不认真对事物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希图用一个药方去包治百病，用一种程式去解决人世间千差万别的各种矛盾，干什么都喜欢“一刀切”的做法，是违反辩证唯物论的，是不足取的。

战争是流动的，发展的。在着眼战争特点的同时，还必须着眼其发展。否则，也不可能对战争进行科学的指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特别是中国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他指出，在这两个战争过程中我军的战略存在着四个时期、三个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前后出现的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并不是形式上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许多不同的内容。毛泽东通过论证战争的辩证性质，揭示了这样一个军事辩证法原理：战争的指导者必须随着作战对象的不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及时地正确地实行战略转变，绝不能用老眼光去看

待新问题，用过时的老套套去解决新矛盾。

当然，要真正着眼战争的变化与发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国国内战争过程中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就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原因何在呢？一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因而仍然沉溺于游击性，右了；二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不是搞“中国型”的正规战争，左了。这里，正确转变之难，从哲学角度讲，就在于主观落后于或超过了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没有达到科学的统一。

不仅战略应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战役、战术原则乃至武器装备也要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预见抗日战争后期（反攻阶段）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时曾经指出：“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从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三十余年，这种“装备新式武器”的、由中国型向世界型的、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进行得怎么样了呢？无疑，我军的装备比之当年的“小米加步枪”是大大地改善了，但是比之武器装备也在发展的霸权主义者却仍然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军队和作战”从中国型变到世界型的研究，以便更有效地战胜敌人。

战争的特点和战争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战争的形式。当中国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阶段之后，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因为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所以必须“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

究和指导”，但是绝不能认为抓住了这个主要的方面就万事大吉了，还必须重视游击队伍的建设和对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如果忽视了这个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的方面，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由此得出结论：游击战在战争全体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通过对正规战和游击战关系的论述，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统一物的两个方面中，主要的方面并不是唯一的方面，次要的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方面。既要讲两点之中有重点，与均衡论划清界限；又必须强调两点之中哪一点也不可偏废，与任何形式的片面性严格区别开来。这种正确处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原理，对于研究战争是适用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也是适用的。

谈“用力省而成功多”

“用力省而成功多”，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充满着军事辩证法的谋略思想原则。

1946年7月27日，我军在苏北的渔沟（朝阳集）战斗中，集中12个团（实际使用7个团）歼敌两个团；8月26日，又在苏中的如（皋）南战斗中，集中10个团歼敌2个团。毛泽东当即给陈毅等发去电报，肯定这种集中大力打敌一部的打法，指出“这种打法，通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必须教育干部普遍采用”（《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92页）。

战争中，欲要达到预想的成功，必须拿出必要的力量。但

所用之力与所成之功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简单的固定的比例关系。在战争史上，大体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力、功相当，用大力得大功，用小力得小功；一是力、功悬殊，用力省而成功多，事半功倍，或费大力而成功少，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正因为如此，历来的军事家都很注意研究如何“用力少而成功多”的问题。春秋时代的孙武讲过：“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虚实篇》）。张预对这句话注释说：“夫势聚则强，兵散则弱。以众强之势，击寡弱之兵，则众力少而成功多矣。”

“用力省”与“成功多”，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其实它们又是统一的。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就是两者统一的一个条件。战国时期的孙臆说过：“兵不能昌大功，不知会（按：指集中兵力）者也”，“兵用力多功少，不知时（按：指战机）者也”，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而“知会”、“知时”，都是属于指挥艺术方面的问题。能否抓住有利战机，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迅速歼击敌人，战而胜之，是达到“用力省而成功多”的关键，是指挥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志。

也许有人会问：在渔沟战斗中，用 12 个团歼敌 2 个团，分明是杀鸡用了牛刀，为什么说是“用力省而成功多”呢？我们分析问题不能只看现象，只看局部，而必须看到本质，看到全局。

首先，“用力省而成功多”是就战役全局的结果而言的，而不是指战役某一局部的力与功的关系。从局部看来，可能会出现用力多而成功少的情况，但就全局来讲，则必须达到“用力省而成功多”的目的。在渔沟之战中，我军集中 12 个团歼敌 2 个团，力与功之比是 6：1。倘若五个手指分开按跳蚤，令 12 个团分兵出击，每个局部对敌人都不能形成压倒优

势，那便难以整团地歼灭敌人，而每个局部的力与功之比总合起来当然也不可能是6：1。所以，从战役全局来看，集中12个团歼敌2个团，这在当时当地从我军战斗力情况来看，的确是“用力省而成功多”的。

其次，“用力省而成功多”，是就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就问题的现象而言的。集中12个团歼敌2个团，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其实，集中12个团，实际上只使用7个团，那些没有损失或损失不大的部队，还可以迅速转用于新的目的。所以表面上看用力多，而实质上力的损失并不大。那么，不集中12个团或只集中用于直接战斗的7个团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如果指挥员手中只有7个团，他就不会全部都用上，一定要留有预备兵力；而不把7个团全部用上，就很可能全歼不了敌人两个团。克劳塞维茨也说明过这个道理：“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某些参加战斗不多甚至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就可以同参加战斗的部队一同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不难看出，有了这样的部队，在战术上参加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这如同张网捕鸟，虽然常常是一个网眼捕住了鸟，但其它网眼也一同起了决定性作用。

由此可见，形而上学地看，“用力省而成功多”是不可思议的，用辩证的观点来看，“用力省而成功多”则是可能做到的。

集中大力打敌一部，着眼点全在于“用力省而成功多”。在这里，集中大力打敌一部是手段，“用力省而成功多”是目的。但有的人往往把手段当目的，为集中而集中，以为集中就是一切，把集中兵力绝对化了。须知超过了应该集中的限度，反而会造成“用力多而成功少”，或者“成功少而伤亡

多”的后果。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完全相同。要达到“用力省而成功多”的目的，在正确而适当地集中兵力的同时，还应该增强现代军事技术的威力，提高军事学术水平，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探寻“用力省而成功多”的各种途径。

滚扫器、创造性与思维方式

1985年10月21日，《解放军报》第一版右上角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某部班长和他的战友们巧设“滚扫器”，没费一枪一弹，歼灭五名敌人，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

这种“滚扫器”，就是在展开的30米长的铁丝网的两端捆上大石头。当敌人接近我山头上的阵地时，沿着山坡把它推下去，使敌人在滚动着的石头和铁丝网的利刺下丧生。

这则消息，读之令人拍案叫绝。它用事实证明，我们的战士确实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创造性了。他们能在既有的物质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地制宜地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战果。

说起这种“滚扫器”，也真够“土”的，但这种“土”东西过去谁人见过？没有。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而且使用起来效果非常之好，这就叫做创造。

“创造”是个美好的字眼，从古代的弓箭到现代的武器装备，哪一件不是创造的结果？在我军军史上，政治工作有许多创造，军事工作的创造也不少。没有创造，就没有进步，没